doi: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26. 05. 010

投资于人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及其实践路径*

彭冰冰,石凡凡

(嘉兴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投资于人”是超越传统物本逻辑、确立人本导向的重大战略,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该理念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旨归,以激发创造性劳动为实践维度,以拓展社会化与共同体认同为关系向度,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下工具人设定的理论超越。立足时代境遇,投资于人深刻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在实践建构层面,需重塑人是最高价值的投资理念,完善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制度供给,并强化多元协同治理与法治分配机制。这有助于将宏观资源投入切实转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投资于人;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的全面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5-0113-09

投资于人源于经济学领域,侧重探讨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概念逐渐向国家战略层面拓展。2023 年 5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2025 年 3 月,投资于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指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2]相关论述与部署表明,投资于人理念已上升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导向。

西方传统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存在一定局限。它过度追求工具理性,倾向于将人力投资视为获取资本回报的手段,相对忽视劳动者的身心福祉,容易引发社会发展失衡问题。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诉

* **收稿日期**:2026-06-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2023JDZD03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研究”;嘉兴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PSRPIP2026003C)“‘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与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彭冰冰(1979—),男,江西遂川人;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红色文化研究。

石凡凡(2003—),女,安徽阜阳人;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彭冰冰,石凡凡. 投资于人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及其实践路径[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5):113-121.

求,单纯依靠经济学视角难以充分回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如何超越资本逻辑,赋予投资于人更深厚的人文关怀,成为亟待解答的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重新审视投资于人,能够提供新的破题思路。马克思主义人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有助于突破西方经济人假设局限,确立人是最高价值的导向。基于此,本文剖析投资于人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结合现实语境探索其实践建构路径。这有助于丰富投资于人的理论内涵,引导公共资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完善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提供学理支撑。

一、投资于人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

投资于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深刻再现与时代延展。该理念立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从人的内在需要、对象性实践和现实社会关系三个维度,破解了资本逻辑导致人沦为工具化与原子化的现实困境。其内在逻辑在于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替代异化消费,以激发创造性实践克服异化劳动,以构建社会共同体超越孤立的经济人假设。

(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彰显投资于人的价值旨归

资本逻辑容易扭曲人的真实诉求,投资于人超越将人工具化的虚假需要,帮助人摆脱异化陷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投资于人往往沦为提升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经济手段。资本追求无限扩张,剥削人的劳动,并通过"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来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实现其政治统治的"[3]。在此逻辑下,人容易成为实现资本扩张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4]223 这种由资本人为制造的需要,掩盖人对真善美的内在渴求。人被片面塑造为欲望载体和消费机器,导致人的本质异化。

投资于人旨在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回归与发展。超越被资本操控的虚假需要,人真实的需要便指向自身的全面发展。人是能动的实践存在物,其丰富需要在能动实践中不断生成与实现。投资于人的实质是社会为个体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资源,赋能个体创造性实践。这种赋能使个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更加自觉、自由地展现内在潜能与才智,将人的体能与智力外化为客观文明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189 当社会将发展资源倾注于个体生命的丰盈时,这种投资便促成人的本质力量的觉醒。

投射于当代中国,投资于人的现实使命在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现实。在当前阶段,投资于人需要切实回应当下的现实诉求,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5]。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更公平优质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以及更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38 只有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作为一切社会投资的根本归宿,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从物的积累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二)激发人的创造性劳动构成投资于人的实践维度

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构成了确立投资于人理念的逻辑起点。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体制下,劳动被矮化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自身的类本质发生深度异化。在此境遇中,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实践活动的本真意义遭到消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159 在这种异化状态下,资本对所谓"人力资源"的投资,本质上是为了强化剥削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其实践逻辑依然是物的增殖而非人的发展。

投资于人从根本上超越了工具人的物化逻辑,致力于提升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能力。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投资于人所配置的外部资源与制度支撑,无法脱离主体独立生效,它需要通过劳动者自我将知识与技能的内化和外化来实现。换言之,社会投资的最终效能,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7]。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实践的承担者,也是投资于人的真正主体与受益者。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实践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8]208。投资于人通过教育、培训与健康保障等途径,全面淬炼了个体改造物质世界的本领。当劳动者具备了驾驭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卓越能力后,其劳动活动便能超越单纯谋生的被动局限,为迈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

随着主体实践能力的跃升,投资于人的深层逻辑便导向激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从而在最高层次上复归人的主体地位。实践不仅是人改造世界的桥梁,更是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基本方式。随着投资于人带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环境的优化,劳动逐渐摆脱外在强制,向着展现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求回归,个体的劳动过程日益呈现出主动性、审美性与创造性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162。在这种创造性劳动中,“劳动者具有创新的能动性,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9]。当人的实践活动升华为自我驱动的创造性表达时,人便真正摆脱了对物的依赖,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挺立于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位置,这正是投资于人在实践维度上的最高确证。

(三)促进人的社会化与共同体认同拓展投资于人的关系向度

批判西方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原子化预设,是拓展投资于人关系向度的本体论前提。西方理论常将人抽象为孤立的理性经济人,把社会交往简化为纯粹的市场交易与利益博弈。这种视阈割裂了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将宏观的人力资本投资窄化为个体获取市场回报的成本核算。然而,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个人并不存在。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 人始终在具体、复杂且历史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生成、生存和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0]如果投资于人的制度设计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极易导致人际关系的物化与社会凝聚力的消解。因此,把握投资于人的关系向度,必须将其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加以考量。

在关系向度上的核心要义,在于促进个体社会交往能力的跃升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全面拓展。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充分发展“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1],且“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双重发展”[12]。国家与社会对教育、文化、医疗及公共服务的系统性投资,其深层机制正契合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人只有与他人建立丰富的社会关系,才可以运用一切人所创造的条件,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13]推进投资于人,不仅是物质与技能的赋予,更是致力于构建平等互助、开放包容、和谐有序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种投资通过打造公平包容的教育体系、打破阶层与利益壁垒、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为广大劳动者创造了广阔且平等的交往空间,从而在制度层面推动了社会关系的优化与重塑。

个体社会交往能力的增强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最终指向投资于人关系向度的最高层次——促进人的深度社会化与深厚的共同体认同。当公共投资致力于缩小城乡与区域差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其实质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重塑休戚与共的情感纽带与价值共识。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4]655 列宁也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14]这些论断深刻表明,劳动者不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动力,其力量的迸发更依赖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关系与深厚的共同体认同。通过对人本身的系统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精神层面的深度契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这引导个体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将自身的前途命运主动融入国家和民

族的复兴伟业之中。最终,个体在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中,实现从原子化生存向共同体发展的伟大跨越,稳步迈向人的全面发展。

二、投资于人的时代境遇与现实诉求

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投资于人是破解发展难题、推进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在战略全局层面,它驱动中国式现代化从物的积累向人的跃升转变,构筑发展基底。在发展动能层面,它孕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大国竞争优势。在社会价值层面,它打破阶层壁垒,缩小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三大诉求交汇,清晰展现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投资于人的紧迫性与必然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战略需求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投资于人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传统发展模式主要依靠规模扩张和人口数量红利,将人看作单纯的劳动力要素。随着全球科技革命深入和国内人口结构变化,依靠庞大劳动力数量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这要求发展重心转向人口质量跃升。人口素质的提升不会自然发生,必须依靠持续的资源投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5],“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6]。在此意义上,投资于人不是经济运行的附属环节,而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撑。面对民族复兴宏伟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7]落实这一重大要求,意味着全面强化对人自身的系统性投资,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实现从物的全面丰富向人的现代化的跃升。现代化进程不只是国民经济体系拓展与基础设施迭代,核心在于人本身的现代化程度。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物’的逻辑主宰了‘人’的逻辑,……导致物的膨胀和人的虚无”[18]。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强调物质财富积累必须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同频共振。物质丰裕不会自动带来精神境界的升华,人的精神世界充实需要依靠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定向投入。投资于人不仅指向生产要素培育,更指向人的文明素养提升。社会必须统筹物质资源与文化供给,在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同时,通过持续的人文投资构筑丰盈的精神家园。

顺应人的现代化战略需求,持续深化投资于人制度建设与资源倾斜,构成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将人的现代化确立为战略核心,要求在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上,将资源优先配置给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9]。人的现代化需要公平的发展机会与完善的公共服务作为支撑,这正是投资于人在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在这种理念指引下,个体在公平制度保障中获得充分发展机会,社会创新活力就会得到释放。宏大国家战略必须具象化为民众可感可及的真实福祉。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38 始终把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素质作为一切投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投资于人将发展成果转化为个体的发展能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航道上不断前进。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培育新型劳动者的客观要求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演进规律,需将新型劳动者确立为核心要素。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不同于依赖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投入的传统形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实现生产要素的系统性跃迁。在这一跃迁过程中,先进设备、前沿技术与海

量数据,均需要高素质劳动者驾驭和转化。传统劳动力的自然积累难以适应技术迭代的步伐,这就要求通过投资于人进行主动干预与系统培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20]投资于人将物质资本转化为人的智力资本,构建系统性的制度网络,提升人力资本供给规模与质量,精准匹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节奏。

适应产业数智化转型趋势,投资于人是化解技能结构性矛盾、重塑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关键举措。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全球产业链,劳动过程经历深刻变革。这种转型让自动化设备替代大量重复性传统岗位,对劳动者的人机协同、数据分析与跨界融合能力提出新需求。旧有技能体系难以满足新岗位要求,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容易引发结构性失业。这就要求通过投资于人重塑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投资于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6]28,核心目标是“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21]24。在具体实践中,全社会需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等方式,对现有劳动力队伍进行技能升级,使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升级需求相契合。

在国家竞争格局中,聚焦基础研究与颠覆性创新,通过投资于人培育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面对复杂的国际博弈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22]。当前,依靠外部技术引进的路径受限,科技创新自主可控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线。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原创性科技创新,高层级创新活动高度依赖处于认知前沿的拔尖创新人才。“‘投资于人’不仅能够扩大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而且有助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提升全社会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适应性和引领能力。”[23]这种通过投资于人实现的系统性能力提升,将为国家安全与自主创新构筑起可靠的人才屏障。

(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

公共投资缩小人力资本差距,构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能力基础。恩格斯认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4]112 真正的公平需要落脚于实际生活的实质平等。现实中,初始财富分配不均往往转化为个体在教育获取、健康维护等层面的积累差异,进而引发社会分化。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要求超越单纯的物质财富分配,转向人的发展能力培育。投资于人通过国家意志介入,将公共资源优先向欠发达地区与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在源头上弥合人力资本鸿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5]123。这指明缩小人力资本差距的宏观着力点。让全体国民具备相对均衡的发展能力,共同富裕才能拥有坚实的微观主体支撑,人的全面发展才具备现实可能。

聚焦社会流动性重塑与阶层结构优化,构建普惠性投资于人机制,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制度屏障。共同富裕追求的社会形态,要求打破阶层固化,实现人的自由流动与发展。贫困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表现为物质收入匮乏,也体现为发展能力与社会资本缺失。如果仅靠物质救济,难以有效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投资于人通过提供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提升以及完善的公共卫生干预,为低收入群体搭建向上流动的阶梯。教育投资在打破阶层固化中发挥核心作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6]365-366 教育使弱势群体能够凭借自身素养提升有效摆脱贫困循环,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这种对人的内在能力的开发,正是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路径。

坚守机会均等与成果共享的公平导向,推动投资于人真正契合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标尺。共同富裕的价值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将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化为人的内在素质提升。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8]683。使每个成员都得到全面发展,才能深入解决公平问题。这一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1]15。在实践中,机会均等要求破除体制障碍,保证任何个体不因户籍、地域或出身而被排斥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成果共享则要求“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26]79,让财富分配反哺于人的发展。投资于人将社会物质成果转化为个体的发展条件,在起点的公平赋能与终点的公正分配中实现辩证统一,铺就通往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

三、投资于人的实践建构路径

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需要构建合理的实践路径。在理念层面,需摆脱唯经济效益的局限,确立人是最高价值的导向。在制度层面,应聚焦人的多维需求,打造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安排。在机制层面,则需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与科学的评价体系,将资源投入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成果。

(一)理念重塑:超越工具理性,确立人是最高价值的投资导向

反思“唯GDP”与“资本至上”的观念,是重塑投资理念的前提。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资本通过在直接商品生产过程中盘剥劳动力而获得剩余价值;积累以生产为基础”[27],对人的投资被视为获取经济增长或资本回报的工具。这种做法容易导致社会发展失衡。物质财富不断扩张,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与心理健康却常被忽视,人容易沦为经济运转中的消耗品。纠正这一路径,需要追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模式,即“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8]。这要求在投资时摒弃见物不见人的做法,避免因过度追求经济规模和短期效益而损害人的主体地位。

构建投资于人的顶层设计,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最高价值的本位。确立新型投资理念,意味着国家层面的财政支出、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应聚焦于个体生命质量的改善、认知边界的拓展以及生存尊严的捍卫。这种投资体现了对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尊重,也是将社会发展主导权交还给民众的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21]134,“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6]186。这界定了社会投资与改革举措应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最终指向,避免在经济数据的追逐中迷失人的存在价值。

在公共政策实践中,践行这一理念要求统筹兼顾物的投资与人的投资,实现物质财富积累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29]466。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等物质投资,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坚实基础。教育普及与社会保障等人力投资,则是激活这一基础并赋予其文明内涵的关键变量。两者相互支撑,不可割裂。“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生产效率提升,进而促进物质资本增加价值,而增加价值的物质资本又为更高水平的人力投资提供资源基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互促共进。”[30]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最终指向形成一个相互促进、不断上升的良性循环系统。

(二)制度供给:回应多维需求,完善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现代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是投资于人在能力建设层面的基础制度供给。马克思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4]340。国家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协同发展,超越传统的应试选拔与技能灌输。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31]。这种体系为各类社会

成员提供持续更新知识与技术的支撑,使劳动者在快速变化的产业结构中,具备驾驭复杂劳动和前沿技术的创造力。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终身学习网络同样重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2]阶段性的教育投入由此转化为持续激发人的创造力的长效机制,实现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

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投资于人在健康维护与风险防范层面的核心制度安排。马克思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4]531。随着经济总量增长,人的需求从基本生活物资升级为对高品质公共服务的期盼。投资于人的制度供给超越提供最低生活救济的初级阶段,拓展至医疗健康、养老保障、托育服务等公共福利的全方位供给。这有助于群众化解疾病、失业和老龄化等社会风险,保障人力资本持续积累。完善的保障能“在短期内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在长期提高劳动者技能与健康水平,形成推动内需扩张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双重效应”[33]。构建普惠可及的公共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托底。

拓宽社会流动渠道,推动投资于人在连贯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全生命周期的制度闭环。投资于人需要引导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和谐发展。国家需要“把教育、健康、就业服务、住房保障、育幼养老与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供给,组织为贯穿生命周期的连续性安排”[34]。这些举措拓展个体的社会交往空间,促成跨群体、跨地域的深度融合。打破身份固化、捍卫起点公平,将教育提升与社保托底有效串联。个体的能力提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投资闭环,使投资于人的制度红利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三)机制协同:强化治理合力,推动投资效能向人的全面发展转化

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是突破单一配置局限、提升投资于人综合效益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单一投入或市场的自发调节,难以独立承载全生命周期投资的要求。各方需要厘清权责边界,重塑“公共主导,多元参与”的协同模式,切实“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35]。政府聚焦战略规划与基础性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主体发挥资源配置的敏捷性,精准对接产业升级所需的技能培训。社会组织积极帮扶弱势群体。这种发挥政府引导、调动市场参与、凝聚社会协同的治理架构,能够“提升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的韧性与可持续性”[36],为投资于人战略落地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是校准投资于人治理方向的关键环节。“投资于人是一个长期过程,要确保投资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监测、评估、调整体系”[37]。构建该体系需要确立清晰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25]55 评价体系应将群众获得感作为核心标尺,把身心健康、社会参与和服务均等化纳入考核。通过科学评估,推动“构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体系,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38]。评估与配置的有机结合,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际成效。

完善法治与分配制度,构成投资于人成果转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底层保障。治理机制的协同与评价体系的优化,需要依靠法律制度加以固化,并依托合理的财富分配,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在法治层面,需要强化对各类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群体的权益保护。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消除职场歧视、规范用工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健康权与发展权。在财富分配层面,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调节,防范资本对劳动收益的过度挤压,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持续自我提升提供物质基础。

四、结语

投资于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这一理念超越了将人视为纯粹生产工具的资本逻辑。它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归宿。满足群众期盼、激发创造活力、建立和谐关系,均离不开投资于人的支撑。国家完善公共政策,持续投入资源,为民众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正如恩格斯所展望的那样:“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9]563-564 当前,不断深化投资于人战略,全面优化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正致力于将这一理论构想转化为现实。面向未来,全面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基础,也是全体人民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当投资于人的政策红利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时,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将紧密相连。这一实践将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J].求是,2024(22):4-8.

[2] 李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N].人民日报,2025-03-06(3).

[3] 王雨辰.虚假需要、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求是网评论员.“投资于人”,见物更见人[J].红旗文稿,2025(18):48.

[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7] 祝林林.“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唯物史观意蕴[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3):15-25.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田永坡.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N].学习时报,2025-02-26(A1).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5.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

[12] 邓龙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历史演变及内涵[J].人民论坛,2015(2):219-221.

[13] 周航,牛先锋.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理论视野,2025(2):34-39.

[14]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1.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16]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

[17]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5-06(1).

[18] 蒲德祥.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逻辑——基于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分析[J].哲学研究,2025(7):5-16.

[19]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N].人民日报,2024-04-25(1).

[20]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2]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7.

[23] 倪红福,王晓星.以“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改革,2025(6):42-55.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7] 黄玮杰. 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资本化及其效应——基于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J]. 南京社会科学,2023(12):17-24.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张林山,公丕明.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协同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J]. 改革,2025(12):100-110.
[31]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 人民日报,2024-09-11(1).
[32] 习近平. 推动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J]. 求是,2026(8):4-9.
[33] 都阳,崔慧敏. “投资于人”:关键问题与实现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6):31-43.
[34] 黄栩. 社会再生产视域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学理阐释[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151-160.
[3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1).
[36] 陆杰华,谷俞辰. 投资于人:全人群全周期人口服务体系的转型与发展[J]. 行政管理改革,2025(11):14-21.
[37] 魏建. 投资于人:以人的全面发展强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1):1-7.
[38] 李海辰,杨蔚. 深入理解“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 经济学家,2025(9):36-46.

Investing in People: Its Marxist Humanist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PENG Bingbing, SHI Fanfan

(School of Marxism (School of CPC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vesting in people” represents a major strategic shift that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material-centered logic and establishes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embodying profound Marxist humanist implications. This concept takes the satisfaction of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the stimulation of creative labor as its practical dimens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socialization and community identity as its relational dimension. In doing so, it achieves a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of the instrumental treatment of human beings under capital logic. In the current era, investing in people directly addresses the practical demand for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ree interrelated imperativ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ris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calls for reorienting investment priorities toward people, improv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across the full life cycle, and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legal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These efforts will help translate macro-level resource investment into tangible outcomes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hereby providing solid support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investing in people; Marxist humanism;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责任编校**:邓龙奎)